

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 評介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

黃宣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作者主張：在強調被研究者觀點、重視歷史面向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整體論解讀社會現象、不排除使用文化概念等前提下，接納認知科學的理論與概念，可以豐富人類學的內涵。族群方面的研究便是如此。

本文以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為例，呈現上述的看法。這五位學者分別是：John Comaroff、Fredrik Barth、Rogers Brubaker、Francisco Gil-White 與 Lawrence Hirschfeld。雖然他們對於「認知」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有運用認知科學的一些概念或理論進行族群研究，因此值得評介。

全文分成三個部分。首先交代作者對人類學的看法，其次介紹五位學者的相關論點，最後從研究架構與方法等不同層面，來討論從認知角度切入進行族群研究的可能貢獻與限制。

關鍵詞：認知，族群，文化，歷史，社會過程

* 謝辭：本文撰寫期間，曾蒙陳文德、蕭阿勤、謝繼昌與蘇羿如等人提供寶貴意見，謹此表達謝意。此外，衷心感謝本刊兩位審查人的細心閱讀與善意建議。部分意見已納入本文中，但限於篇幅與能力，無法完全依照審查人建議修改，一併表示歉意。

I

自從1980年代以來，伴隨著臺灣政治結構的民主化，「族群運動」即成為臺灣社會的一個顯著現象。¹ 其中不但包含著原住民族、平埔族、客家、外省人等運動，也包括了所謂「四大族群」論述的興起。這種情形，在1987年解嚴之後更為明顯（王甫昌2008）。針對臺灣的這類社會運動，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以及公共行政學等皆有學者投入研究，也累積了相當可觀的文獻可供參考。本文以筆者專長的社會／文化人類學為主，聚焦於族群研究的相關理論，評介最近的一股發展趨勢。

回顧檢視人類學文獻，原生論（primordialism）²與環境論（circumstantialism）³的爭議是早期族群理論的基調，有關這兩個理論的討論相當多。原生論在歐洲的萌芽甚早，強調的是族群的與生俱來成分。⁴環境論出現時間稍晚些，比較傾向於從人類社會的結構與情境變化來解釋族群的形成。⁵

在早期社會觀與文化觀都偏向靜態的情況下，族群往往被認為伴隨著特定且獨特的文化特質。換言之，早期有關族群的研究，傾向於假定其有一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但二次世界大戰之後，Edmund Leach（1954）在緬甸，以及Michael Moerman（1965）在泰國的研究都發現，族群的界線與文化成分之間沒有清楚的關聯。研究族群的相關文化時，從強調客觀指標（objective indicators）轉變為重視行為者的主觀焦點（subjective focuses）。這樣的觀點形成了Fredrik Barth後來提出的邊界（boundary）理論。

1 一般將「族群」對等於ethnic group，此處暫時採用之。註20將對此有更多的討論。

2 亦有人將之譯為「根基論」，例如王明珂（1997）。

3 英文有時亦稱之為situationalism或instrumentalism，中譯則有「情境論」、「工具論」的不同表達方式（參見王甫昌2003；王明珂1997）。當然，「環境論」、「情境論」與「工具論」之間有不少差異，但相對於原生論仍其共同點，所以可以歸為同一類別。

4 代表性學者有Max Weber, Clifford Geertz等人。

5 關於原生論、環境論這兩個理論的介紹頗多，有興趣者可以參考McKay（1982）、Scott（1990）、Gil-White（1999）等人的討論；中文方面則可參考王明珂（1997）、王甫昌（2003）、黃應貴（2008）等人相關著作。

Barth 在1969年主編出版了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一書。此書基本上將族群視為一個社會組織，而 Barth 主張：針對族群做客觀的描述，還不如觀察族群的邊界來得重要。換言之，他認為在研究族群時，如果我們過度去強調族群的顯著文化特質，就會變得比較像是文化分析，而不是在研究族群組織。Barth 的重要貢獻在於：把族群認同的研究由文化內容 (content) 轉向邊界的研究，並且強調行為者認為重要的才是值得重視的。此書的重要意義在於，認為族群意識的形成不在於族群的共享文化內容，而在於主觀上具有區分「我群」與「他群」的族群邊界。此一觀點深深影響後來人類學的族群研究。⁶

然而，自從這本書問世以來已經超過40年，人類學理論早有長足的發展。由於人類學強調被研究者的觀點，提供行為者意義系統的「文化」，乃成為人類學研究最核心的概念。而人類學者在積極尋求新的文化概念時，不但是為了「更有效地呈現被研究社會的文化特色，同時企圖剔除既有理論裏的文化偏見，特別是資本主義文化的偏見。」(黃應貴2008:57) 在這樣的發展脈絡下，筆者對於社會/文化人類學有以下三個基本看法。

首先，是人類學研究必須歷史化。當代的社會/文化人類學是1920年代確立的。換言之，結構功能論式的田野調查方法，使得社會/文化人類學者的關懷面向偏向同時性的 (synchronic) 研究，相對地就比較忽略貫時性的 (diachronic) 面向。這種情形在1940-50年代強調社會過程 (social process)，或者1960年代象徵論 (symbolism) 興盛時，基本上沒有太大的變化。這樣的研究取向，特色是在自然的社會情境進行研究，也試圖從社會文化脈絡來理解人類行為的意義。但這樣的探討方式，有一個難題必須解決：如何解釋社會文化變遷現象。

從1970年代開始，人類學界出現結構馬克斯論 (structural Marxism) 與政治經濟學 (political economy)，乃是人類學者企圖引進 Karl Marx 的觀點，

6 Anthony Cohen (2000:3) 指出：Barth 的貢獻是把兩個先前獨立的研究課題結合在一起，其一是「固定的族群」(bounded ethnic group)，另一是「族群認同的策略手段」(tactical management of ethnic identity)，並認為兩者都是變動的，且可以因情境而變化。關於 Barth 的邊界理論已有不少中文介紹，有興趣者可以參考王明珂 (1997) 與黃應貴 (2008) 等人的相關著作。

使得人類學可以處理變遷問題的開始。進而在1980年代中期之後，受到 Marshall Sahlins 的影響，有了歷史人類學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的新發展。這種歷史人類學採取了「文化如何界定歷史」的切入方式，因此，此時的歷史具有多重的意義，亦即除了一般所認識的客觀層面的「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 之外，還包括行動者主觀的層面，例如「歷史性」(historicity)、「歷史編纂」(historiography)、「歷史意識」(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歷史再現」(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這些主觀層面皆與文化有密切關聯。這樣的歷史觀，使歷史研究不再局限於「歷史就是發現真實」的看法，而注意到多元歷史的存在，使得人類學研究加入歷史面向後更有解釋力。又因為歷史人類學可以跟強調文化體系的人類學研究結合，所以成為當代最活躍的人類學次分支之一。

其次，是人類學研究應該繼續以文化為分析概念。1960年代開始，人類學在此方面已有一些反省 (Ribeiro and Escobar 2006)。到了1980年代初期，在文化結構論和實踐論蓬勃發展的同時，與後現代主義 (或後結構論) 發展密切關聯的後現代人類學也開始發展。這種人類學研究方式強調民族誌書寫本身，也彌補了先前理論忽視文化內部差異的缺失 (參考黃應貴 2008: 88-89)，但人類學的核心概念「文化」卻也岌岌可危，原先的科學性更受到嚴厲挑戰。面對這樣的處境，人類學者要如何因應？筆者接受若干認知人類學者的主張，認為在適度修正後，文化概念仍然可以使用，而且可以據此重新建立人類學的知識體系。⁷ 換言之，筆者可以接受後現代、後結構對於先前理論的批評，意即「人文性」確是人類學研究的重要環節，但不贊成「人類學研究不可能科學」的主張。所以筆者認為，人類學既是人文學科，也有科學性的一面。

最後，是將認知角度納入研究架構有利於人類學發展。自從1920年代以降，由於 Durkheim 理論傳統的影響，主流的人類學研究比較重視集體性，因而社會、文化乃成了重要的分析概念，特別是文化概念，更成了人類學者

7 1950年代，由於電腦科技的發展，包括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都有學者從此一新發展切入，強調人類認知面向的重要性，解決學科內部的一些問題。認知人類學便是在此一背景下形成的。有關認知人類學的發展，可以參見 D'Andrade (1995) 的著作。由於個人能力與篇幅限制，本文有關認知的討論以認知人類學為主。

最核心的概念。1950年代中期，人類學者 Ward H. Goodenough 及 Floyd G. Lounsbury 創立了認知人類學，他們採納語言學者的分析方式，以親屬稱謂為研究重點，試圖理解被研究者的認知方式，使用的方法稱作「成分分析」(componential analysis)。⁸ 這種在當時認為非常「科學」的探討方式，一度非常吸引人。但在1960年代後期之後，由於「語言等同文化」、「文化又等同認知」的假定受到嚴厲挑戰，加上來自象徵論、結構論等的競爭，因而逐漸沒落。新一波的認知人類學研究是1980年代中期受到心理學基模 (schema)、原型 (prototype) 等觀念影響，才又重整旗鼓。

事實上，1980年代之後兩個最重要的人類學理論——薩林斯 (Marshall Sahlins) 的文化結構論與布爾迪厄 (Pierre Bourdieu) 的實踐論——都有探討被研究者觀點的企圖，但布爾迪厄的處理方式較具有「認知」的色彩。換言之，他理論架構中的習癖 (habitus) 概念，與認知人類學的基模相似。因此雖然他不太強調自己是認知人類學者，但1980年代之後的認知人類學者大多將實踐論當作發展的基礎，例如 Strauss 與 Quinn 即是。在他們合寫的 *A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al Meaning* (1997) 一書中指出，文化是人類學研究的關鍵概念。他們也主張，人類學研究要探究的是社會現象 / 行為的意義。他們的核心架構奠基於 Bourdieu 的實踐論，但特別強調認知面向的重要性，因此除了援用 Bourdieu 已經有的 schema 概念之外，更引進了來自人工智慧 (A. I.) 研究的聯結論 (connectionism)，由於兩種理論的結合，使他們在重視人們內化經驗方式的情況下，文化的意義既有某種的程度的穩定性，也不是完全僵硬、不可變動，而可以不斷地再修正與相互競爭 (Strauss and Quinn 1997)。

在這樣的基礎上，筆者不傾向於接受認知人類學早期的探討方式 (如成分分析等)，而是偏重於晚近的一些理論——例如基模論與聯結論。⁹ 這樣的探討方式特別著重兩個層面：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個人如何內化文化？而文化又如何成為一個人社會實踐的依據？由此可見，此一架構是以實踐論 (practice theory) 為基礎，但企圖將之與認知人類學的若干研究相結合。筆者認為，此

8 目前較常被稱為特徵分析 (feature analysis)。主要是以語言材料為分析對象，試圖探索語言使用者的分類體系。詳細介紹可參見黃宣衛 (1998: 83-86)。

9 因為成分分析中的文化比較是客觀的，與後來強調主觀層面的文化觀不同。

種探討方式有助於讓我們了解：同一社會中何以不同成員間會有差異，但彼此對許多事物的看法又大同小異，使得社會生活仍能繼續進行？此外，對於文化的持續與變遷也應該可以提出不同於前人的看法。¹⁰

筆者認為，在強調被研究者觀點、重視歷史面向在人類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以整體論解讀社會現象、不排斥使用文化概念等前提下，接納認知科學的理論與概念，絕對有益於人類學的研究，族群方面的研究亦然。本文將以五位學者的相關研究為例，呈現這樣的看法。這五位學者分別是：John Comaroff、Fredrik Barth、Rogers Brubaker、Francisco Gil-White與Lawrence Hirschfeld。雖然他們對於「認知」的看法不盡相同，但都有運用認知科學的一些概念或理論進行族群研究，因此值得注意。必須先聲明的是，族群研究已有相當長遠的歷史，基於不同理論立場，學者對族群現象的解讀方式大不相同，相關詞彙的使用方法也不盡相同。上述五位學者之間亦然。本文重點是評介他們的主要論點，並不表示筆者贊同他們的所有看法，也不表示筆者已經有一套對族群研究的完整論點。

II

首先是John Comaroff的研究成果。他與Jean Comaroff夫妻倆長期研究南非Tshidi社會，且有非常豐碩的成果。但此處想討論的只是John Comaroff最早發表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1992[1987]）一文中，作者一開頭就藉由蘇格拉底式寓言（Socratic parable），點出ethnicity研究的核心問題：它是需要被解釋的分析對象（object of analysis），還是可以闡明某類人類存在重要面向的解釋原則（explanatory principle）？¹¹為了解答ethnicity產生、延續以及轉變，乃至族群意識（ethnic consciousness）方面

10 相關討論可參見Strauss and Quinn(1997)。

11 關於ethnicity一詞的使用，有必要稍加說明。早期研究偏於由客觀角度探討文化與族群，因此傾向於將ethnicity譯成「族群性」。但在強調由主觀角度探討文化與族群時，ethnicity有時亦被譯成「族群意識」。跟「族群」一詞一樣，ethnicity在不同學者使用時有不同意涵，這方面工作有待日後釐清。因此，本文暫時不將這個詞彙翻譯成中文。

問題，John Comaroff提出了環環相扣的五個命題 (propositions)，其中最為關鍵的有以下幾點：ethnicity是一組區分人群（我們vs他們或自己vs他人）的社會關係，與圖騰制度 (totemism) 一樣，都是人類進行社會分類的基本法則，但圖騰制度比較是在同質社會中進行對等的分類，ethnicity卻是在社會分工的背景下，形成具有階序性的分類；因此，ethnicity的社會意識不是如Max Weber等人強調，是來自原生的連帶 (primordial ties)，而是特殊歷史動力 (specific historical forces) 下的產物，而且通常是政治、經濟上的弱勢者爭取自身權益的手段；一旦ethnicity形成了，就會發展出自主的動力 (autonomous force)，成為左右社會生活中的一股力量。

John Comaroff採取歷史唯物論 (historical materialism) 立場，結合了實踐理論與歷史過程來論述 ethnicity 問題。他區辨出個人與集體層次的族群意識，在歷史過程中同時強調內在與外在影響因素，一方面賦予族群意識變動的可能性，也賦予個人行動選擇的空間。整體而言，他強調 ethnicity 形成的歷史動力，以及強調結構上的不平等關係，就此方面而言，基本上可歸為環境論者，但因他有實踐理論的基礎，加上關切的是人類學者強調的社會過程，因此其研究架構的完整性頗讓人信服。筆者認為，他的兩個觀點特別有意義，其一是 ethnicity 的意義與重要性因不同社會群體在各自社會秩序的位置不同而異，其二是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已有我們vs他們的關係，但這絕不等同於當代意義下的族群意識。¹²

Fredrik Barth的後期研究也值得注意。雖然他在1969年的著作中，非常強調族群邊界對族群意識的重要性，相對地文化就似乎比較不受重視。但追究Barth的原意，邊界的意義系統仍有賴文化邏輯來支撐，因此文化仍是不容忽視的環節，而在晚近的人類學族群研究中此一面向越來越被強調。事實上Barth (1994) 在Vermeulen與Govers合編的一本論集中即已指出，文化在族群研究上扮演重要的地位。此時的文化觀事實上已經與早期迥然不同，亦即不是強調文化的客觀層面而是比較注重主觀的層面，因此個人的經驗、意

12 基於環境論的立場，他似乎已排除了族群為一社會事實的可能性，筆者覺得此方面的觀點值得斟酌。換言之，ethnicity背後真的沒有普同的結群原則嗎？這是筆者認為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後文有關範疇限定性、民間社會學、民間生物學的討論，便與此有關。

識受到高度的重視。Barth 在這篇論文中分三個層次來探討族群現象：鉅視 (macro)、中間 (median) 與微觀 (micro)。國家政策與全球脈動是鉅視層次的兩大重點；中間層次是用來描述集體性的創造過程，以及不同人有不同目的但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動員；至於微觀的面向焦點是個人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而主要目的是描繪出影響個人經驗的過程以及個人認同的形式。微觀層次的重要性是觀察大環境因素如何匯集，造成每個人活動與詮釋的實際脈絡，並反過來回饋到其它層次。¹³

Barth 在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2000) 一文中，藉由省思邊界的概念及其社會作用，來賦予邊界理論新的意涵，更明顯地將認知理論用在研究架構。他首先以英語的使用為例，認為邊界的意義可分成三個層次：邊界「在地面上」劃分出不同的領域，邊界設定不同社會群體的界線 (limit)，邊界提供了樣版 (template) 來區分人們心靈中的不同類別。他舉海洋與陸地的區分為例，認為在類別的區分上未必一定要有邊界，換言之，邊界的觀念與分類上的區分 (distinction) 是可以脫鉤的，但英語使用者慣於想像海洋與陸地間要畫一邊界。在這樣的情況下，也慣於以邊界的意象，來區分不同社會群體，特別是那些與領域有關的群體。他以自己研究過的新幾內亞叢林 Baktaman 以及阿拉伯沙漠 Basseri 兩社會為例，指出在居無定所，人群聚合也不斷變化的情況下，不但各有特殊的社會觀，邊界的概念也迥異於西方社會。換言之，他認為若人類學強調的是當地人的觀點，則他們心中的邊界概念如何，這樣的概念又與他們的社會行動間有何關聯，便是一個必須探討的課題。

為了進行這樣的討論，Barth 引進了語言學者 George Lakoff 的認知理論。Lakoff 在《女人、火與危險事物》(1994[1987]) 一書致力於認知語意學 (cognitive semantics) 的探討。他使用基模的概念，把一些原屬不同範疇的相關詞彙聯結在一起，以便對這些詞的語意有進一步的了解。顯然他認為：如果要對語言有深入的掌握，不能不探究背後的文化因素，因此他提出一般民間理

13 對於個人經驗與意識的重視，在同一本論集中 Cohen (1994) 的文章更為突顯。他將邊界的概念分為集體意識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與個人意識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來探討，這就將族群研究中個人層次的經驗與觀點，帶入相當重要的位置，不但展現邊界與意識之間的複雜關係，也使得族群研究與認知發生關聯。這樣的關聯越到後來越為明顯。

論 (folk theory) 的觀點。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Lakoff 認為我們的概念建立在三類感覺的來源上：其一是我們對部分與整體形貌的完形感覺本能；其二是我們在空間中身體活動的經驗；其三是我們對於世間可感覺事物能形成豐富心智意象的能力。¹⁴ 接受了這樣的基本假定，Barth 認為歐洲傳統下的特殊邊界意象，源自於人類使用工具的能力。由此延伸出去財產觀、領域觀，乃至於認為社會團體皆有清楚界線，都是來自於這樣的基礎。然而，其他社會中未必會有同樣的意象與基模。以 Basseri 與 Baktaman 社會為例，領域界線根本就不重要，對於社會團體而言，劃分邊界也不是那麼必要。換言之，各自有其理解自身社會的重要意象。因此 Barth 主張，在人類學研究的基礎上，我們可以納入 Lakoff 之類的認知理論，以便讓人類學的研究更為豐富。換言之，Barth 認為如何將認知研究引進族群研究中，是值得繼續拓展的一個方向。

另一位要介紹的是 Rogers Brubaker，特別是他跟其他人提出的 ethnicity as cognition 觀點。Rogers Brubaker 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社會學教授，1990 年代初以研究歐洲（德國、法國與前蘇聯）的民族問題與公民權著稱，也長期關心美國的移民狀況。1998 年開始，他或獨自或與同僚（如 Mara Loveman、Peter Stamatov、Fredrick Cooper 與 David Laitin）等人合作，陸續發表相關論文 8 篇，並於 2004 年集成一本專書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下文即以他的著作為基礎，介紹從認知角度來探討族群的若干議題。

首先是社會科學用語的釐清。Brubaker 在好幾篇文章（Brubaker and Cooper 2000；Brubaker and Laitin 1998；Brubaker 2002）中都呼籲：社會上的一般用詞不應與社會科學的分析詞彙混淆。「認同」（identity）一詞的釐清是最好的例子。在 Brubaker 與 Cooper 合寫的“Beyond ‘Identity’”（2000）一文中，他們一開始就指出，identity 一詞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出現，但探究其背後

14 根據 Lakoff (1994[1987]) 的論點，我們的基本概念 (basic concepts) 與分類 (categories) 與人類在環境中的生活經驗緊密關聯。換言之，在晚近認知科學有關心靈研究的啟發下，Lakoff 對於理性等相關問題，提出了一套異於傳統的經驗實在論 (experiential realism) 觀點。簡言之，「傳統的觀點認為，理性是抽象的、脫離肉體的，而新近的觀點認為，理性具有肉體的基礎。傳統的觀點把理性看作是客觀的，認為他主要是關於客觀上非對即錯、非錯即對的命題，新近的觀點則把理性中具有想像力的方面——如隱喻 (metaphor)、轉喻 (metonymy) 和內心聯想 (mental imagery)——看作是理性的中心，而並非客觀事物外在的、次要的附屬。」(ibid.: xvii)

卻混雜了不同層次的意義，因此他們建議以下列三組詞彙來取代之：(1) identification and categorization, (2) self-understanding and social location, (3) commonality, connectedness and groupness。¹⁵

這樣的區分，與他們從認知面向來看待 ethnicity 有關。早期有關族群的研究，傾向於假定其有一共享的文化 (shared culture)，這樣的觀點在 Fredrik Barth 提出邊界理論之後，已經相當程度地被推翻了。如前面所述，晚近的研究一方面強調文化 (尤其是主觀角度) 在族群研究上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承認由認知面向切入的必要。Brubaker 在好幾處都強調此點，也指出人類學、心理學有關認知的研究，對族群探討極有幫助。在 “Ethnicity as Cognition” (Brubaker, et al. 2004) 一文中，作者回顧了認知方面由 stereotype, social categorization 到 schema 的概念發展，並認為從這些概念切入族群研究，既可以直接探討這些現象發生的認知機制 (cognitive mechanisms) 與過程 (processes)，也可以在用鉅視角度探討族群現象時，提供微觀的基礎 (micro-foundations)，使得論證更為堅實。

在這樣的出發點上，他們認為研究的重點不只限於與族群有關的社會分類，也應包括行動者如何看待社會世界 (seeing social world)，以及詮釋經驗 (interpreting social experience)。因而他們強調，不要將族群視為「世間的東西或實體」(things or entities in the world)，而要視之為人們「看待事物的方式」(ways of seeing)，或是「看待世界的一種觀點」(perspective on the world)。基於此，他們也將 ethnicity, nationalism 與 race 視為一個範疇 (domain)，認為嚴格地區分這三者並無必要。對他們來說，族群研究的首要工作是探討「日常生活中的 ethnicity」。

此一立場，使得他們在進行族群研究時，著重的不是族群的「實質」(substance) 內容，而是其「過程」(process)。一般人 (甚或研究者) 在談到族群時，常會假定其是一個「有清楚界線的群體性」(bounded groupness)，而屬於此一群體的成員共享某些東西，包括相當的 ethnicity 在內。但 Brubaker 等人認

15 這三組詞彙的中文翻譯，有待更深入研究後才能完成。事實上與族群有關的詞彙概念，不但在英文中如 Brubaker 所言非常混淆，在華文世界裏更是需要釐清。此處雖暫時將 identity 一詞譯為「認同」，但這只是從俗的作法，並未能把「身分」、「名分」等其他層面的意涵包括進來。

為，擁有群體性的是組織 (organization)，而不是族群本身。換言之，族群運動者會試圖喚起群眾的熱情，強調族群的共同特性，以便形成一個團結的群體，但未必所有具同樣族群身分者都有同樣的經驗與均質的族群性，他們參與運動的程度也就不同。在這樣的情況下，探討族群現象時不應認為族群必然會有團體來相應，反而要探討族群團體是在怎樣的主客觀條件下形成的，也就是觀察群體形成 (group building) 的過程。

這樣處理族群的方式，既保有了環境論強調大環境對族群運動影響與注重過程的精神，另一方面也因為是從認知角度出發，從主觀的文化層面連接了原生論的若干討論方式，使原生論再現生機。要言之，Clifford Geertz (1963) 當年倡議原生聯繫 (primordial attachments) 源自於「既有物」(the givens)，包括血緣、宗教、語言、習俗等。問題在於，主張這個論點的學者長期以來未認真區分這個「既有物」是來自誰的觀點，使得原生論飽受抨擊。Brubaker 指出，若將「既有物」清楚定位為從行為者角度出發，不但會使認知的探討變得極為關鍵，原生論的理論基礎也會更為穩固。另一方面，環境論將族群性描繪為視情境而變化，此固然有其道理，但其過程究竟如何，顯然仍有許多不明朗處。從認知角度出發，可以補上微觀的過程，使得環境論的論證更為完整。基於這樣想法，Brubaker 認為原生論與環境論不是互不相容的，而可以有其互補性。

上述 Brubaker 的部分論點，在 Francisco Gil-White 與 Lawrence Hirschfeld 的研究中，有更進一步的發展。而他們倆的研究又牽涉認知人類學的最新發展。

有關認知人類學的發展趨勢，可參閱黃宣衛的介紹 (1998)。然而，認知人類學最新的一波影響則是來自演化、腦神經等方面研究，強調先天與後天的交互作用，以及發展在個人與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性，核心概念是所謂的「範疇限定性」(domain specificity)。¹⁶ 概要地說，以往的研究在假定人類的認知能力時，傾向於認為人類的心靈好似一個綜合處理器 (a general processor)，針對不同類別的知識時是以同樣的一套認知能力去處理，Jean Piaget 可

16 黃宣衛 (2007) 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對此有較詳細的介紹。

說是代表性人物。但目前有一些研究指出，在學習的過程中，包括人類在內的一些動物會對不同類型的外在刺激賦予不同的預期與推理。換言之，在面對不同類型的外在現象時，心靈會以不同的範疇限定性原則 (domain-specific principles) 來運作。

目前在人類學的研究中，已有不少學者接受這個概念，並用在親屬、族群、宗教等不同研究中。從「範疇限定性」切入的族群研究，要面對的關鍵問題是：族群概念 (知識) 是否來自特定範疇的能力？還是衍生自其他類別的知識？依目前比較有共識的看法是，除了 Noam Chomsky 以來發現的語言學習能力之外，原初物理學 (naive physics)、原初數學 (naive mathematics)、民間生物學 (folk biology)，以及原初心理學 (naive psychology) 是人類演化結果所具備的基本認知能力，¹⁷ 只要有適當的社會文化環境，孩童都能以主動的心靈運作，迅速地習得這個類別的知識。但有些類別的知識，肯定並非來自特殊範疇的認知能力，而是其他類知識混雜的結果，例如天文學、宗教等知識皆是屬於此一類型。¹⁸ 至於族群等社會類別 (social category) 的知識，其性質則有待更多的研究才能釐清。這也是這方面研究特別有趣之處。

據筆者所知，從「範疇限定性」切入的族群研究有兩個主要的論點。其一是認為並沒有一個特定的認知範疇促成族群知識的產生，相反地，前述的民間生物學 (或原初生物學 naive biology) 是人類必然會學得的知識，族群方面知識是民間生物學「轉化」 (transfer) 的結果。Gil-White 是持這個觀點的代表性人物。另一個論點則以 Lawrence Hirschfeld 為首，他認為族群知識不完全來自其他類別知識，而有相當成分的基本能力在內。

Gil-White 是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人類學博士，目前在賓州大學任職。他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主標題是：“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Needs Better Categories” (2005)。很明顯地，此文有呼應 Rogers Brubaker 前述論點的味道：社會上的一般用詞不應與社會科學的分析詞彙混

17 此處主要是採用 Hirschfeld (1994) 的觀點，但民間生物學是否屬於此類知識，仍有一些質疑 (參見 Bloch, et al 2005)。

18 Hirschfeld (1994) 在此方面有綜合性討論。Pascal Boyer (2001) 則在宗教方面，有更細緻的討論。

淆。他們倆也都主張，應該從認知層面切入，釐清與族群有關的一些學術用語。進一步來說，Gil-White同意Brubaker的說法，認為一般在使用ethnic group此概念時過度強調其「群體性」(groupness)，其實若從認知角度來切入，很多情況下所謂的ethnic group指涉的是一種類別(category)，而未必是一種群體(group)。因此他跟Brubaker都主張，nation是政治上的用語，race則是生物學上用語，兩者都不是社會分析的概念，在研究時應該避免使用。¹⁹但Gil-White比Brubaker更進一步的是，他主張用ethnie一詞來取代ethnic group。²⁰除了因為這樣可以避免過度強調其群體性之外，還因為Brubaker主張ethnicity跟nation與race一樣都是虛構的，實際上沒有這樣的東西存在，但Gil-White對此並不贊成。也就是說，Gil-White認為，只要有一群人自認為屬於一個ethnie，那麼這個ethnie就存在，他們的認同感就是這群人的ethnicity。依Gil-White的論點，心理認同是ethnie存在的充分條件也是其必要條件，與nation、race兩詞的情況截然不同。

Gil-White採取三個指標來界定ethnie。首先是「依據繼嗣取得成員身分的意理」(An ideology of membership by descent)；其次是「認為有一個獨特且同質的文化」(The perception of a unique and homogeneous culture)；第三是「同類通婚的規範」(Category-based normative endogamy)。當三個指標都符合時，就構成一個原型的(prototypical)ethnie。Gil-White也在這樣的定義下，明白地表示：ethnie與clan、religion、tribe、race都不同，有其獨特的性質。

Gil-White有關族群的實證研究是在西蒙古Hovd省的Bulgan Sum地區，主要對象是當地的Torguud族(1999)。除了不同支系的蒙古人之外，此處還住有一些哈薩克人，而若就族群層面而言，哈薩克人是蒙古人最重要的「他者」。這兩大族群在生計、宗教等方面並沒有太多的區別。除了進行一般的人

19 但nationalist與nationalism是有意義的分析概念，必須保留。

20 ethnie在英文中仍不常見，在華文世界似乎更是新概念。按其原意，似乎可譯為「族類」。然而，坊間已有一本翻譯書使用「族類」這個詞彙，而其對應的英文有時是ethnic，有時又是ethnicity (Rex 1991)。若與「親屬」通常對應的英文(kinship)來相互對應，似亦可考慮將ethnie譯為「族屬」。現階段為了從俗，仍暫時稱之為「族群」。這也再次顯示相關詞彙、概念的整理非常重要與急切。

類學式田野調查之外，Gil-White 還設計了一份三個問題的問卷，針對蒙古人與哈薩克人的區辨，在成人間進行半開放式訪查，其目的是探討當地人對族群身分 (ethnic status) 取得 (acquisition) 與傳遞 (transmission) 之看法。他發現學術界雖然偏向於認為「族群是建構而來的」，但田野資料卻顯示，原生論普遍存在於蒙古人與哈薩克人之間。他從認知切入族群研究的架構，既考慮到原生論、環境論，也對之後的邊界理論有精彩的討論，是族群研究時可以參考的重要文獻。

Gil-White 在這篇文章中，也提到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的一個重要概念：心理本質論。一些相關研究已經指出，人類面對東西 (things) 時傾向於認為其有某些本質 (essences)，亦即因為這些東西之會如此乃是有些潛在的特性 (underlying nature)。面對有生命的東西 (living kinds) 時，這種情形更是如此。舉例來說，很小的孩子也會知道，狗再怎麼改變外觀，也不會變成貓，因此狗之所以為狗，是因為有內在的「狗性」，與其外觀沒有必然關聯。以此概念為基礎，Gil-White 推論說，人類也會傾向於認為 ethnic 具有本質，就像貓跟狗的內在特性不同一般。這就涉及 Gil-White 的另外一篇論文。

這篇題目為 “Are Ethnic Groups Biological ‘Species’ to the Human Brain?” (Gil-White 2001) 的文章，呈現出作者的基本假定。要言之，在「範疇限定性」的出發點下，Gil-White 認為族群在許多人心具有相當強的本質性，但其來源不是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而是從生物界的種屬 (species) 知識衍生而來。Gil-White 認為這當中涉及人類演化、適應上的過程，更重要的是兩類知識之間有兩個共同點：category-based endogamy 與 descent-based membership。這樣的論點，與 Lawrence Hirschfeld 明顯不同。

Hirschfeld 與 Gil-White 最大的共同點在於，兩人都是從認知角度切入來研究族群，且都接受「範疇限定性」的基本假定，認為長期的演化使人類具有一些共同的認知能力，而且這些能力先天上就分成不同範疇。然而，相對於 Gil-White 的研究是以傳統人類學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即使採用成人問卷調查也是在自然的社會生活情境中進行——Hirschfeld 主要是在實驗室中做研究，且是以孩童為主要調查對象。而除了 Gil-White 強調的演化之外，Hirschfeld 更加上了對孩童認知發展的關心面向。

Hirschfeld長期任教於密西根大學(Ann Arbor校區)的人類學系，最近才轉到New School for Social Science任職。綜觀他的許多研究(Hirschfeld 1988, 1996, 1997, 2001, 2002)，都在大聲疾呼人類學應重視孩童的認知發展，他甚至提倡應該有一個人類學的分支叫「孩童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childhood)。這樣的主張來自於對許多人類學研究背後假定的批判：孩童腦中的知識來自於成人的教導，而成人腦中的知識是社會化的結果。但若接受「範疇限定性」的基本假定，對於人類的認知能力、心靈的運作方式及學習對文化傳承的作用等，必然有不一樣的想法。Hirschfeld便是從這樣的立場出發，進而主張孩童其實在學習時有其相當強的主動性，絕不是被動地接受大人的知識灌輸，與族群有關的知識之習得亦然。

有必要在此稍做說明的是，Hirschfeld的研究是以歐美社會的孩童為對象，²¹而在歐美社會中最顯著的族群差異來自於以膚色分類為主的種族(race)，因此其在著作中一貫使用race一詞。而他認為種族概念來自於這樣的想法：人類種類奠基於共同的天生或內在特色屬性。²²依筆者的看法，Hirschfeld對於種族的界定與Gil-White所定義的ethnie相近，因此本文仍視Hirschfeld的研究為「族群」研究的一環。²³

他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呈現在*Race in the Making: Cognition, Culture and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Human Kinds*專書中(Hirschfeld 1996)。這本書主要是探討一個有趣的問題：種族的概念在生物學上已經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但為什麼還是會普遍存在於人類社會？他回顧了先前的兩類種族研究，其中心理學著重的是一般性的訊息過程(information processing)，缺點是並未真正處理種族的問題。另一類比較研究強調歷史背景等結構因素，通常會試圖解釋各地社會文化的差異性，且傾向於以殖民過程來說明當代的種族問題，但此種研究方式無法說明為什麼類似現象會在各地普遍存在。因此，他提出一

21 Hirschfeld曾先後在美國與法國進行孩童族群認知發展之研究(1993, 1996, 1997, 1998)。

22 The race concept...emerges out of a notion of human kinds predicated on the attribution of common inherent or intrinsic features(Hirschfeld 1996:13).

23 Hirschfeld(1996:42-55)曾討論race與ethnicity的複雜關係。他認為其使用的race也可以改稱為ethnorace，而且可以視為ethnicity的一種極端類型。但他反對將兩者完全區分，因為這會忽略了兩者間的連續性。

個同時處理心智 (mental) 與結構 (structure) 的種族理論。他選取了三組孩童做調查，分別是三歲、四歲與七歲，以圖片為主問孩童一系列的問題，問卷設計含有膚色 (黑白)、體型 (胖瘦) 與服裝代表的行業 (警察、護士) 等變項，目的在探討孩童的種族思考是如何發展的。

他的主要發現是，小孩其實並沒有一個內在的 (endogenous) 種族理論，²⁴ 可是有一個內在的「人類種類理論」 (theory of human kinds)，他將這種認知能力統稱為原初社會學 (naive sociology) 或民間社會學 (folk sociology)。Hirschfeld 認為，正常的情況下孩童在兩歲半至三歲時這樣的能力就開始發展了。不過 Hirschfeld 再三強調，這種與生俱來的認知能力並不會直接產生種族知識，換言之，孩童是在特殊的文化環境中，主動尋求相關的訊息 (尤其是語言方面訊息)，逐漸建立其種族知識。因此，社會文化環境對於種族知識的產生仍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他的理論同時兼顧了認知與文化，前者提供了解釋種族概念何以容易理解、學習、傳遞，以及普遍存在於各地的現象；對後者的強調，則容許不同地方、時代的特殊性，這種成人間相當程度裡共享的知識，是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成分，也提供了觸發孩童種族概念的因子，但其對下一代的影響其實並不如以前認為的那麼具有決定性。換言之，只有從發展的過程，觀察後天的文化環境與先天的認知能力如何交互作用，才能掌握種族觀念是如何代代相傳，且普遍存在於各地。

III

以上五位學者都觸及族群方面研究，且都有從認知科學的相關概念、理論切入，因此本文選擇他們的相關著作加以評介。五位學者中，除了 Brubaker 是社會學學者之外，其餘五位都是人類學學者，人類學式田野調查也就成為大多數人 (包括 Comaroff、Barth、Gil-White) 的主要方法。比較特別的是 Hirschfeld，他的研究主要在實驗室進行，且研究對象是孩童。顯然他雖然是

24 或者說，種族不是一個與生俱來的概念 (innate concept)。

人類學學者，但屬於非主流的心理人類學（或認知人類學），且研究方法受到心理學（尤其是發展心理學）影響頗大。至於 Gil-White 在蒙古的研究雖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為主，但佐以半開放式問卷蒐集資料，也是其比較值得注意之處。

在研究架構方面，五位學者原則上都接受文化作為分析概念，尤其以人類學田野調查為主要研究方法的 Comaroff、Barth、Gil-White 等人，更是將文化的持續與變遷作為探討重點，對文化的系統性較多著墨；相對之下，社會學學者 Brubaker 雖有觸及文化概念，也認為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概念（包括 ethnicity 在內）是研究切入點，但對於文化的系統性處理仍不及上述人類學者。五位學者也都同意將歷史納入研究架構，只是方式與強度不同，其中以 Comaroff、Barth 以及 Brubaker 最為顯著。社會學學者 Brubaker 強調從過程來探討族群，這樣的方式與人類學的歷史化研究取徑不謀而合。但是因其對文化的處理不是那麼有系統，他的歷史分析也就不免較為單薄。

雖然五位學者都強調從行為者主觀角度探討人類現象的重要性，也都有引用認知相關概念或理論，但其間的差異仍然頗大。大致上來說，可以分成兩大類。Comaroff、Barth 與 Brubaker 等都接受基模的觀念，因此不但可以處理文化的變與不變，也相當程度解決了個人間差異的問題。這樣的方式用在族群研究中，可以使討論更為細緻，也的確帶來一些新意。然而筆者認為，若他們能接受認知理論的後期發展，例如 Strauss 與 Quinn (1997) 一樣將聯結論的觀念帶入研究架構中，不但可以對文化理論有更好的處理，對於族群的探討也會更進一層。或者如 Ross (2004) 般，一方面強調文化為研究的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從 J. Wassmann 與 C. Antweiler 兩位認知心理學者處借來抽樣、統計的研究方法，用來探討文化共識模式 (cultural consensus model) 在人群中的分布樣貌，²⁵ 則有關族群的探討也會更為細緻。

Gil-White 與 Hirschfeld 迥異於前面幾人，採用「範疇限定性」觀念來做為研究的起點。這樣的探討方式，處理的重點不是更細緻化文化，而是探討人類的普同心理機制。這樣的研究方式，除了 Barth 在接受 Lakoff 的認知語意學時

25 亦即探討文化概念在報導人間的相同與差異情形。

有類似企圖之外，並不見於其他採納基模論的學者。但儘管有同樣的理論立場，Gil-White與Hirschfeld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與問題意識方面仍然有很大的差別。簡要地說，Gil-White主要是在自然的社會情境（蒙古）進行研究，且主要是探討成人的族群認知，Hirschfeld的研究則是以歐美的孩童為主，探討主軸是「孩童如何習得族群（種族）概念」，研究場域則以實驗室為主。在範疇限定性的假定下，共同的問題在於：不同範疇的知識性質如何？孩童又如何習得（或發展出）某特定範疇的知識？這當中牽涉到因果思考的問題，也與本質論的討論有關，涉及的是兒童認知發展研究的重要議題。更具體地說，在有關族群的孩童認知發展研究上，要問的是這類知識究竟涉及那些範疇？不同社會的那些相關知識可歸為此一範疇？特定社會的孩童又如何學會這方面的知識？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此種研究要面對的。筆者認為這樣的基本假定頗有發展性，因為它不但提供了跨學科合作的可能性，也因為從這樣的假定出發，提供了同時探討人類普同性與差異性的架構。另外，筆者也同意Hirschfeld的看法，認為孩童的認知發展研究非常重要。因此筆者建議，爾後的人類學研究應設法同時包括孩童與成人，以使探討的層面更為完整。

另一方面，歷來族群方面的研究與理論已經相當多。除了早期的原生論、環境論與邊界論之外，後來還有強調文化與過程的建構論（constructionism，如Linnekin and Poyer 1990；Astuti 1995）。如前面所述，從認知角度切入，可以豐富人類學研究的內容，²⁶而Brubaker與Gil-White等人的研究也顯示，這個角度切入後可以重新定義相關詞彙與概念。由此出發，也可以對原生論與環境論的爭議提出新的觀點，這些都是從認知角度切入對族群研究可能有的貢獻。但若以Barth（1994）提出的族群研究三個層次來思考，認知只是切入微觀層次的一個環節，其實不宜過度誇大其重要性。換言之，筆者認為整體觀仍是瞭解人類社會文化現象的基本方法，若想對族群有更完整的看法，則大環境的歷史動力、以及社會文化層面的作用等也都是重要的角度。事實上，本文介紹的五位學者也都有這樣的體認。舉例言之，Brubaker認為從認知角度探討族群，要注意的不是個人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而是「社會心智」

26 事實上，Levine在“Reconstructing Ethnicity”（1999）一文中便明確指出：認知是當代族群理論的「缺漏面向」（missing dimension）。

(sociomental) 現象，亦即是企圖聯結文化與認知、以及鉅視與微觀的關懷 (Brubaker, et al. 2004: 52)。即使是以實驗室研究為主的 Hirschfeld (1996: 14) 也表示，其致力的是文化心理學的 (cultural psychological) 或普同建構論者的 (universal constructivist) 研究，顯然文化與建構論都是他架構中的重要環節。

而 Barth (2000) 一方面指出，人類學者應該盡可能地運用認知理論，以便讓我們的研究更完整，但他也強調，我們必須妥慎使用認知理論，而不是將人類學研究簡化成認知研究的分支，卻忽視了社會互動過程的重要性。Barth 再三強調，在我們研究對象的生活世界中，認知過程是重要的一環，但其他社會過程卻也絕不能忽視。事實上，認知過程會決定社會過程，反之，社會過程也會影響認知過程。然而，這兩個過程之間，卻絕對不是簡單的鏡像 (mirror images) 關聯，而有其極為複雜的關係。他以南斯拉夫的例子指出，當地的族群關係相當複雜，非同時透過社會過程、認知過程兩個層次的互動，並放置在長遠的歷史變遷過程才能有較完整的理解。這樣的觀點也見諸於 Comaroff 的著作中。

總之，從認知的角度切入，或者接納認知科學的概念與理論，與人類學研究並不悖離，甚至可以豐富人類學的研究內涵，族群方面的研究亦然。換言之，筆者心目中的人類學研究，應是接近 Comaroff 與 Barth 的思維，同時注重文化與歷史，加上有豐富的田野資料，分析時因而能更細緻，且呈現出多因素、多層次的圖像。²⁷ 因此，如何將認知角度與已有的不同探討角度結合，用來探討臺灣目前方興未艾的族群現象，會是一個有趣而值得嘗試的努力方向。

27 Comaroff 夫婦有關南非的系列研究之特色，可見於黃應貴 (2008:93) 的討論。

參考書目

王甫昌

- 2003 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臺北：群學。
 2008 由若隱若現到大鳴大放：臺灣社會學中族群研究的崛起。刊於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謝國雄編，頁 447-521。臺北：群學。

王明珂

- 1997 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臺北：允晨。

黃宣衛

- 1998 「語言是文化的本質嗎？」——從認知人類學的發展談起。臺大考古人類學刊 53: 81-104。
 2007 心靈、學習與文化傳承：認知人類學最近發展的一些觀察。思與言 45 (4): 179-200。

黃應貴

- 2008 反景入深林：人類學的關照、理論與實踐。臺北：三民。

Astuti, Rita

- 1995 *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th, Fredrik

- 1969 Introduction. *In*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 F. Barth, ed. Pp. 5-38.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94 Enduring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it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eds. Pp. 11-33. Amsterdam: Het Spinhuis.
 2000 Boundaries and Connections,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A. C. Cohen, ed. Pp. 17-36. London: Routledge.

Bloch, Maurice, Gregg E. A. Solomon, and Susan Carey

- 2005 What is Passed on from Parents to Children: A Cross-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Essays on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urice Bloch, ed. Pp. 61-85. Oxford; New York: Berg.

Boyer, Pascal

- 2001 *Religion Explained: The Evolutionary Origins of Religious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Brubaker, Rogers

2002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Archives Européennes Sociologie* XLIII (2): 163-189.

2004 Ethnicity without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baker, Rogers, and David Laitin

1998 Ethnic and Nationalist Violence.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 423-452.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1): 1-47.

Brubaker, Rogers, Mara Loveman, and Peter Stamatov

2004 Ethnicity as Cognition. *Theory and Society* 33: 31-64.

Cohen, Anthony P.

1994 Boundaries of Consciousness, Consciousness of Boundaries: Critical Questions for Anthropology.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eds. Pp. 59-80. Amsterdam: Het Spinhuis.

2000 Discriminating Relations: Identity, Boundary and Authenticity. *In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ony P. Cohen, ed. Pp. 1-13.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Comaroff, John

1992 [1987] Of Totemism and Ethnicity. *In Ethnography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John Comaroff and Jean Comaroff, eds. Pp. 49-67. Oxford: Westview Press.

D'Andrade, R.

1995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throp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ertz, Clifford

1963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c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Clifford Geertz, ed. Pp. 105-157. New York: Free Press.

Gil-White, Francisco

1999 How Thick Is Blood? The Plot Thickens: If Ethnic Actors are Primordialists, What Remains of the Circumstantialist/ Primordialist Controversy?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2: 789-820.

2001 Are Ethnic Groups Biological 'Species' to the Human Brain? : Essentialism in Our Cognition of Some Social Categori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2(4): 515-554.

2005 The Study of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Needs Better Categories: Clearing up the Confusions that Result from Blurring Analytic and Lay Concepts. *Journal of Bioeconomics* 7: 239-270.

Hirschfeld, Lawrence A.

- 1988 On Acquiring Social Categories: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Anthropological Wisdom. *Man*(N. S.)23: 611-638.
- 1993 Discovering Social Difference: The Role of Appear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Racial Awar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25: 317-350.
- 1994 Is the Acquisition of Social Categories Based on Domain-Specific Competence or on Knowledge Transfer? *In* Mapping the Mind. L. Hirschfeld and S. Gelman, eds. Pp. 201-23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Race in the Making: Cognition, Culture and the Child's Construction of Human Kind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1997 The Conceptual Politics of Race: Lessons from Our Children. *Ethos* 25(1): 63-92.
- 1998 Natural Assumptions: Race, Essence, and Taxonomies of Human Kinds. *Social Research* 65(2): 331-349.
- 2001 On a Folk Theory of Society: Children, Evolution, and Mental Representations of Social Grou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Review* 5(2): 107-117.
- 2002 Why Don't Anthropologists Like Children? *American Anthropology* 104(2): 611-627.

Lakoff, George

- 1994 [1987] 女人、火與危險事物，梁玉玲等譯。臺北：桂冠。

Leach, Edmund

- 1954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evine, Hal B.

- 1999 Reconstructing Ethnicity.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5(2): 165-180.

Linnekin, Jocelyn, and Lin Poyer, eds.

-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McKay, James

- 1982 An Exploratory Synthesis of Primordial and Mobilizationist Approaches to Ethnic Phenomen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5/4: 395-420.

Moerman, Michael

- 1965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7: 1215-1230.

Rex, John

- 1991 種族與族類 (Race and Ethnicity)，顧駿譯。臺北：桂冠。

Ribeiro, Gustavo Lins, and Arturo Escobar

- 2006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In*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Arturo Escobar, eds. Pp. 1-25. Oxford: Berg.

Ross, Norbert

- 2004 Culture and Cogni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Metho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Strauss, Claudia, and Naomi Quinn

- 1997 A Cognitive Theory of Cultural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ott, George M. Jr.

- 1990 A Resynthesis of the Primordial and Circumstantial Approaches to Ethnic Group Solidarity: Towards an Explanatory Model.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3(2): 147-171.

黃宣衛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11529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 128 號

sh5@gate.sinica.edu.tw

Studying Ethnic Group from Cognitive Perspectives: Review of Research by Five Scholars

Shiun-vey Huang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Under the premise of emphasizing emic viewpoints, placing importance on historical contexts in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interpreting social phenomenon holistically, and not rejecting the incorporation cultural concep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e deployment of theories and concept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can enrich the study of anthropology. I believe this is also the case for studies on ethnic group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above viewpoint through related research by five scholars: John Comaroff, Fredrik Barth, Rogers Brubaker, Francisco Gil-White, and Lawrence Hirschfeld. Although they hold different opinions on “cognition,” all have applied some concepts or theory from cognitive science when undertaking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which deserves attention and review.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explains my perceptions on anthropology. Then, I introduce related issues rais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five scholars. Lastly, through an analyses of these author’s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I discuss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and limits of cognitive perspectives in ethnic group studies.

Keywords: cognition, ethnic group (or ethnies), culture, history, social process
